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著

420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姚文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7年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 3/8 字数27,000

1967年1月第1版 196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0

统一书号：3074·452 定价：(五)0.10元

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象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閻王殿倒塌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結，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綫为目标的資产階級反动路綫，也必須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階級革命路綫和資产階級反动路綫两条路綫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資产階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綫，必須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貫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紅旗反紅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們现在和今后識別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員。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創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題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創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

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

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

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說的“一些共產黨員”，為首的就包括周揚。周揚當時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他自稱“我自己很早就看了電影《武訓傳》”，這部電影是經過他批准後在全國範圍放映的。這部反動電影一出來，立刻被毛澤東同志發現了。當時，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揚，《武訓傳》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電影，必須批判，還沒有說到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就被周揚頂了回來。周揚趾高氣揚地擺出一副十足的貴族老爺架子，十分輕蔑地說：“你這個人，有點改良主義有什麼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以後，在毛澤東同志的嚴厲責問下，周揚被迫出來做了几句假檢討。實際上他一直陽奉陰違，尋找機會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訓傳》批判刚开始，周揚立刻就寫了一封黑信給他的一員大將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具體處理要慎重，仔細，不可急躁魯莽”。并焦急地說：“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實情況”。于伶當時竊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長，他包庇和勾結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謂“慎重，仔細”，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細”保護資產階級力量，保護那些披着文藝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謂“不可急躁魯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盡量削弱毛主席批評中尖銳的政治內容，採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最後化為一個“認識”問題。周揚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謂“真實情況”，就是要收集保護資產階級右翼的種種材料，進行反黨活動。這是周揚一伙在《武訓傳》批判過程中的一次反黨大陰謀。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組織了一个武訓历史調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钟惦棐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調查結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連續发表的《武訓历史調查記》一文。这篇經過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鉄的事实揭开了武訓这个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辯論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鉄証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資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說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認識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搖身一变，出来做“系統的”总结，好象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別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評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訓传》批判“糾偏”。他在題名为《为創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說：“自电影《武訓传》批判以后”，“我們的批評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糾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評”，“一部分讀者的偏激意見”（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評），再加上党的領導不“支持”所謂“創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緒是需要設法轉变的。”

請看，周扬在这里“糾偏”糾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訓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評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

學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產黨員”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階級刚开始批判資產階級，周揚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階級的呼声是多么敏銳啊！

請看，《武訓傳》批判前后，周揚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領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澤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領导，抗拒毛澤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連忙来个假檢討，蒙混过去，欺騙党、欺騙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賬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轉，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們，請注意，周揚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們就可以看清楚周揚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經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資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綫，不甘心死亡的資產階級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們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崗、饒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的一些資產階級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揚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們壟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資產階級“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則

采取了貴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們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論，毒辣地鎮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綫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紅樓夢〉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銳地深刻地批評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鎮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憤慨地說：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們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讲統一战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宮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銳批評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轉載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馮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貫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綫。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題为《論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領導力量之一”，說什么离开了他們“革命就搞不成”，胡說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沒有知識，

“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識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謂“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創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許无产階級插手資产階級“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資产階級“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們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紅樓夢〉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資产階級知識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負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們看，这不是簡直把中国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捧上

-
- ① 《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綱”；一面狂热地誣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調，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資产階級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資产階級反动路綫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們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資产階級，他們用以观察問題的是地主資产階級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們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嗎？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产階級反动路綫的人，他們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資产階級世界观，他們保护剥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了天嗎？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

你的所謂“全面批判”不过是搖身一變的故技重演，這是為了保持你竊踞的領導地位，以便把鬥爭拉向右轉，開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們不是連續發表了成百萬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據、祖宗考據、大觀園地址考據……等等奇談怪論，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圖，為胡適派唯心論實行了一次大復辟嗎？

第三次大鬥爭，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緊接着批判胡適而展開的反对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這是一場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親自領導之下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銳鬥爭。是對反革命勢力的一个嚴重打擊。周揚的思想同胡風思想本質上是一樣的，他同胡風一樣，反復鼓吹“藝術的最高原則是真實”（一九五二年），反对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反对毛澤東思想。他同胡風一樣，反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農兵鬥爭中去，甚至狂妄地說“不去，也還是可以結合的”，“我們和工農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貴族老爺自居。他同胡風一樣，反对寫重大題材，反对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大力鼓吹所謂“選擇題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證這種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風一樣，主張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反对階級分析，用所謂“新的國民性的成長的過程”（一九四九年）之類人性論的語言，來歪曲勞動人民的階級面貌和階級性格。他同胡風一樣，提倡“創作就是一個作家與生活格鬥的過程”、就是“主觀和客觀完全融合”“物我一體”（一九四一年）之類極端反動的主觀唯心論的創作方法。他同胡風一樣，把西方資產階級文藝奉作至高無上的祖師。胡風的反動文藝思想，周

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謂“批判”胡风的座談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編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語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們的借口”，他們攻击的目标是我們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綫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騙局。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轉。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紀念〈草叶集〉和〈堂·吉訶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已經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間。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針鋒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訶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則”，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則；他特別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紀美国资产阶级詩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

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象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珂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

本主义道路嗎？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嗎？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